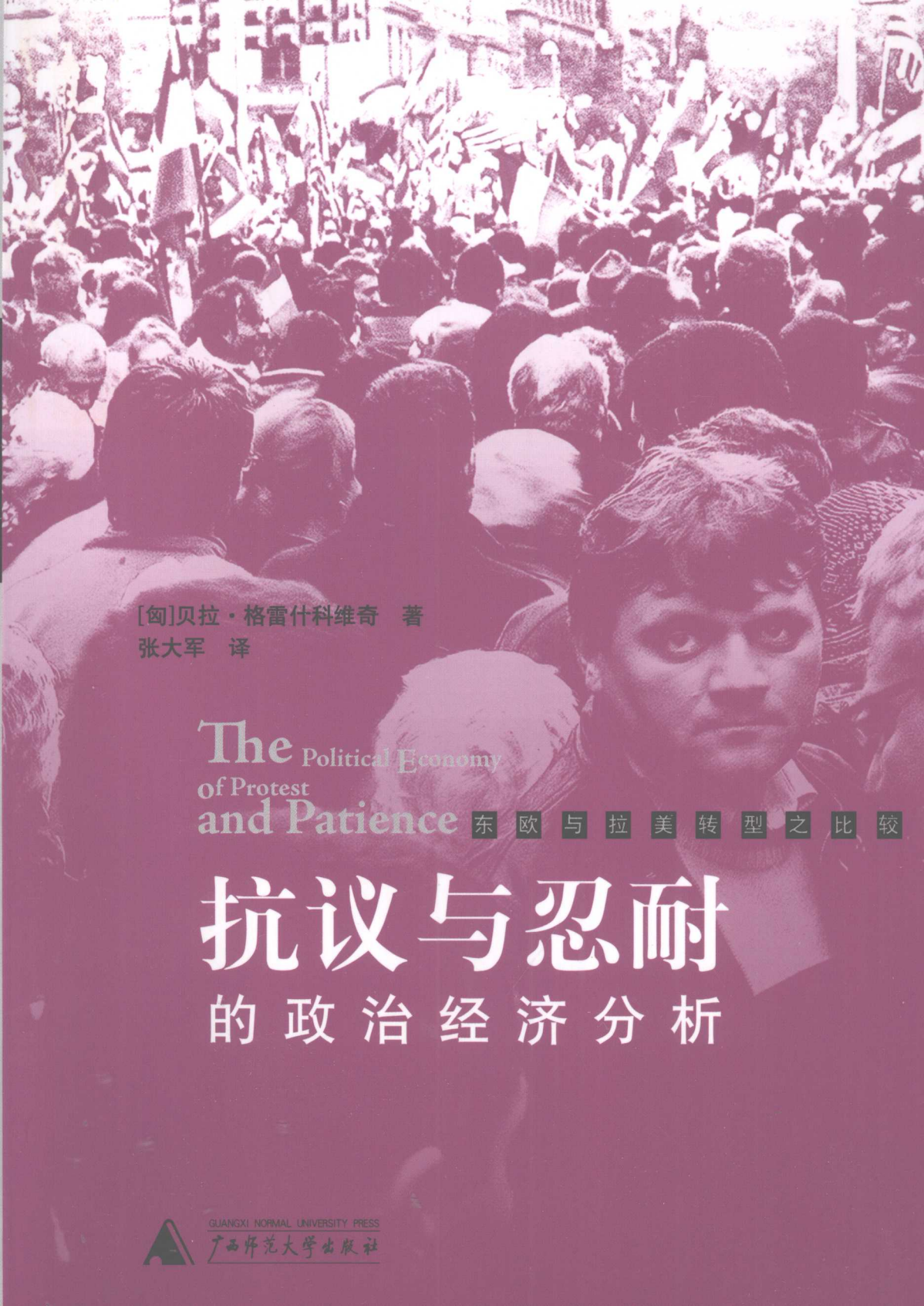




[匈]贝拉·格雷什科维奇 著
张大军 译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test
and Patience

东 欧 与 拉 美 转 型 之 比 较

抗议与忍耐

的政治经济分析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东欧与拉美转型之比较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test
and Patience

抗议与忍耐

的政治经济分析

[匈]贝拉·格雷什科维奇 著

张大军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

Béla Greskovit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test and Patience*

© 1998,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东欧与拉美转型之比较/
(匈)格雷什科维奇(Greskovits, B.)著;张大军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7-5633-8397-9

I. 抗… II. ①格…②张… III. ①政治体制改革一对比
研究—东欧、拉丁美洲②经济体制改革一对比研究—东欧、
拉丁美洲 IV. D521 F11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313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 bbtpress. com)

出 版 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三河市燕郊镇圣屯)

开本:960mm×690mm 1/16

印张:16 字数:156 千字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6 000 定价: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代 序 / 003

前 言 / 007

第一章 引言：崩溃预言的消失与低质民主体制的到来 / 011

第二章 1980年代与1990年代的危机与新自由主义转型 / 032

第三章 孤立的经济改革者 / 050

第四章 当地的改革者与外国顾问 / 071

第五章 对经济困难的社会反应 / 088

第六章 对后共产主义时期民粹主义的再思考 / 113

第七章 民粹型转轨策略：从比较的角度看匈牙利经验 / 138

第八章 补偿：政府的一种策略 / 165

第九章 匈牙利转型中的冲突、社会协定与民主发展 / 185

第十章 能抵御危机的低质民主体制 / 210

注 释 / 223

参考书目 / 233

代序

民主转型时期国家治理的技艺： 一种三位一体的分析架构

政治是一种追求善的事业。这种表现为普世价值的善不完全是抽象的，而是要具体化到攸关具体权利主张和利益分配的公平正义的制度中去。一个尚未实现公平正义制度的国家的首要任务便是转型为一个这样的国家。转型过程本身就是决定公平正义能否实现的关键所在。因此，转型过程也往往是充满戏剧性色彩的历史时段。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大部分实现了这种转型的国家都经历了艰难的一跃，无论是英国的光荣革命与美国的独立革命，还是后来南欧和东欧等地形形色色的革命和剧变，都在表明，转型过程充满着各种挑战，成功确实来之不易。更有甚者，很多国家虽然也有艰难的一跃，但这一跃并不成功，后来又退化回去，功亏一篑，甚至比之前的状态更糟，比如中国的辛亥革命，俄国的二月革命，法国大革命都是如此。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实在在于转型时期是一个国家的非常态时期，其间各种矛盾和争斗交汇聚集，风云

激荡，原有的秩序结构解体，而新的秩序结构尚未成形，转型国家毫无例外都在这时驶入历史“三峡”的河段。

从某种程度上说，能否克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克服这些挑战和问题便成了转型过程最终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而这就牵涉到至关重要的转型时期国家治理的手段、技巧、方法和战略等实际问题。笔者将之称为转型国家治理的技艺问题。《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分析转型国家治理技艺问题的独特视角，也即三位一体的转型治理分析架构：经济效能上的有效性、行政管理上的可行性以及政治实践上的可欲性。书中对此一架构有所解释：“经济可行性是指对经济专家而言的理论上的说服力与解决问题的效能；行政管理的可行性是指能够以新的有助于改革进程的政府体制代替现存的政府体制；政治可行性是指其在建立联盟与维持政治支持力量方面对政治人物的效用。”

（Hall，1989，转引自Kahler，1990，58）

这种分析架构首先与转型之所以发生的契机和背景有关，作者指出，东欧国家的经济危机与社会不满的根源是经济发展战略和体制本身的失败。这让东欧国家付出严重的社会代价：“急剧降低的生活标准、收入与财富快速的两极分化、社会安全网的退化、迅速升高的失业率以及新的贫困现象。”这样的社会经济背景无疑为政治抉择给出了限定性条件和制约性选项。于是，作者认为：“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早期关键的政治抉择以及外部不同程度的影响都使得东欧国家转型过程中的政治活动受制于经济环境。”

反过来，在一个常态社会（也就是没有面临迫近的大规模的人身安全和生存危机，诸如各种战争、灾荒、瘟疫等），经济利益的分配可以说是牵涉面最广的利益分配。这种分配既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符合公平正义准则的标杆，理所当然地就成为政治最为关心的领域之一。“新的政治制度可能会起到安全阀的作用：它们将对社会不满情绪的表达导入民主程序之中，并由此造成一种延迟和平衡的效果。民主化没有威胁到

经济稳定与转型，而是最终成了它们的政治工具。”

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经济与政治之间的互动是通过“行政”——政策的制定执行和反馈调整——这一媒介实现的。当然，与过去的专制时期相比，作出恰当的政策选择可能更为不易，而执行过程也往往会遭到政治上的挑战。经济政策的选择无疑要受到政治动员和政治控制的影响乃至左右，但经济政策的后果却会导致各样的政治冲突，对政治上的调整 and 适应能力提出挑战。我们在东欧国家看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参与性的民主参与机制与排他性的经济决策机制在这里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东欧国家经济的调整是在一种政治中立的行政环境中进行的。行政中立有两个显著的优点：一方面保证经济政策自身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从而实现经济绩效的最大化。另一方面摆脱各种利益集团的纠葛，从而避免经济政策的人为偏差和扭曲。

东欧国家（尤其是匈牙利）转型的经验就是，政治—经济—行政之间这种复杂互动的结果，形成了一种不同于过去体制的新的秩序结构。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危机与经济转型的影响，民主体制只能在牺牲其某些本质的特性时才能稳定下来。相应地，经济转型只有在牺牲其速度和激进性的情况下才会保持其可行性，而其许多不完善之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变革的民主体制框架所致。经济与政治体制达成一种均衡状态，但是与像西方那样的成熟市场民主体制通常所具有的均衡状态相比，这种均衡处于较低的水平”。

虽然在东欧国家新的秩序结构中，低质民主体制和初级市场体制形成的均衡肯定不是最优的，也远非理想状态，但从转型国家治理技艺的角度来看，这些国家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过渡到这样一种状态，其效果无疑是非常显著的，甚至是令人羡慕的。它们给人的感觉是：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些国家的人民应该感到庆幸的是，他们已经穿过了“历史的三峡”。而对于我们来说，他们的经验无疑是值得重视的，尤其是他们在转型时期的国家治理经验和技艺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咀嚼的。

本书并没有直接明言它要探讨转型时期的国家治理问题，这一提法是笔者对本书内容的一种高度概括。笔者之所以着重谈及转型时期的国家治理问题，是因为这一问题具有现实和理论的重要性与迫切性。虽然政治事业毫无疑问是以一种超越性价值为旨归的，现实的生活和历史则是一种经验的过程，各种理论只是对这一过程的抽象和萃取。笔者翻译此书时的想法是，促使关心中国转型的人士从单纯的理论探讨深化到对转型过程各种政策、手段和方法等技艺的思考。笔者相信，这种转变将是关心中国转型的各界人士心态和思想成熟的标志之一，因为对技艺的思考关注的是生活和历史本身。

最后谈谈书名翻译的问题。很多中国人将书名中的“Political Economy”翻译成“政治经济学”，笔者不赞成这样的译法，而是倾向于翻译为“政治经济分析”。其中的原因在于，政治经济学在当今中国的汉语语境中有特定的含义，这一含义来自我们教科书中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也即所谓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等。而该词组在这里的意思和马克思所谓的“政治经济学”是不一样的，它是指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复杂互动，不存在谁决定谁的问题，至少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那种明晰关系。

笔者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对促进人们进一步思考民主转型的治理技艺以及政治经济的互动关系有所裨益。

是为序。

张大军

2009年3月30日

前 言

与悲观性预言不同的是，尽管东欧国家所面临的是一个比1930年代的大萧条更为深刻和持久的衰退过程，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却似乎在那里扎下了根。是什么因素成就了这样的结果？和十年前拉丁美洲国家人民相比，东欧人为何较少地对体制性变革所带来的残酷的社会后果表达抗议？为何那里没有出现地区性的威权或者民粹转向？这些国家的民主体制为何被证明为具有抗击危机的能力？以及经济危机以何种方式影响到该地区的政治局势？本书着重讨论的就是上述这些问题。我希望通过与拉丁美洲加以对比来帮助拓宽东欧转型研究的视野，反之亦然。我还希望向比较政治经济分析领域中那些想要探究东欧经验的教师和学生以及报道该地区事务的记者们提供有趣的阅读材料。

我花费了四年的时间写作本书。从1993—1996年，我在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政治学系任教。1997年，我在位于华沙的中欧大学社会学系工作。在布达佩斯时，我参与了系里的一个名叫“转型目标为何”的研究项目。我们的目的是对中东欧正在出现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作出恰当的概念性说明。为该项目提供慷慨资助的是中欧大学的创始人乔治·索罗斯

先生。

我之所以能够进行我的研究，提出我的问题，并逐渐得出自己的答案，主要原因乃在于政治学系催人进取的学术氛围以及我的同事们对此的兴趣和帮助。具体来说，如果没有系里每周研讨会所提供的挑战（我在研讨会上就各章的初期草稿作报告，并得益于同事们的研究发现），写作本书将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对下列同事重大的知识贡献，我深表谢意：安德鲁·奥劳托，佐尔坦·巴拉兹，安德拉什·博佐基，安德拉什·布拉格约瓦，安德拉什·布罗迪，拉斯洛·布鲁斯特，伊万·乔鲍，拉斯洛·琼托什，内纳德·迪米特里耶维奇，若尔特·埃涅迪，阿提拉·弗尔斯，斯特凡诺·古齐尼，亚诺什·基什，米哈伊·洛基，安娜·莱安德，陶马什·迈热里格斯，伊什特万·雷夫，陶马什·鲁道什，胡迪特·山多尔，米克洛什·许克什德，以及加博尔·托卡。真吉·彼得拉克和伊什特万·盖尔吉奇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帮助。在中欧大学社会学系时，我的写作得到埃德蒙·默勒津基的支持。我在社会学系的同事布伦达·莱希帮助我纠正了英文版的文字问题。

对于许多匈牙利和外国社会科学学者就本书某些部分的不同版本所作的有益的评论和批评，我表示感谢。提供这类评论的匈牙利学者有：玛利亚·乔纳迪，亚诺什·克勒，亚诺什·科尔奈，安德拉什·科瓦奇，安德拉什·克韦什，卡米拉·拉尼，伊万·马约尔，彼得·米哈伊，安德拉什·纳吉，加博尔·奥布拉特，埃娃·保洛次，彼得·佩特，陶马什·雷提，马顿·陶尔多什，亚当·特勒克，彼得·温采，以及埃娃·沃斯卡。

对于下述外国学者就我之前提出的不同观点的评论和批评，我也表示感谢：莱塞克·巴尔采罗维奇，玛加丽塔·巴尔马塞达，瓦莱丽·邦斯，米歇尔·多布里，格热戈日·爱吉尔特，米歇尔·费德洛维兹，卡罗尔·格雷厄姆，罗伯特·考夫曼，扬·库比克，布龙尼斯劳·米赛塔尔，埃德蒙·默勒津基，琼·纳尔逊，吉耶尔莫·奥唐奈，大卫·奥

斯特，约纳斯·篷图逊，安杰伊·瑞查德，赫克托·谢米斯，亚历山大·斯莫拉尔，大卫·斯塔克，悉尼·塔洛，诺曼·乌普霍夫，以及劳伦斯·怀特黑德。不过，惯常的提示仍然适用：所有的过错都由作者本人承担。

第一章 引言：崩溃预言的消失 与低质民主体制的到来

在苏联解体之后，关于东欧会出现大范围政治与经济崩溃的黯淡预言并没有变成现实。虽然经济衰退的程度很深而且持续的时间很长，东欧的政治生活中却没有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曾出现的那种剧烈动荡的现象。怎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为什么中东欧人对体制变革所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的抗议要少于十年前的拉美人？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中东欧社会在面对经济困难时主要采用了较少破坏性的抗议形式？为什么许多人担心的整个地区范围内的威权主义或者民粹主义的回潮没有出现？为什么这些国家的民主体制能够抵御危机的威胁？经济危机对这一地区的政治领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激励作者写作这本书的是这样两个问题：预言的失败与后共产主义时期的转型现实。¹

预言的失败

到现在为止，在预言东欧的政治与经济发展前景这一问题上，分析

家们几乎一直都表现不佳。大部分专家都没有预见到共产主义体制垮台得如此之快。人们几乎没法反对加尔布雷思（Galbraith）对此的激烈批评：“这一点大概是毫无疑问的，即我们这个时代在经济问题上的最大失误是没能预见到中欧与苏联最近发生的革命性变革。”（Galbraith, 1991, 转引自Wojtyna, 1992, 158）实际上，加尔布雷思本人也犯了这一错误（Aslund, 1991, 31）。

虽然中央计划体制与国有制现在普遍被视作要对共产主义经济的崩溃负责，它们在西方却并不总是这样声名狼藉。几乎直到这种体制终结之时，连国际金融机构的分析家们似乎都认为它有存续下来的机会。他们将这种体制相对成功的表现归因于其通过中央计划机制控制所有资源的能力（Walters, 1992）。

在没能预见到东欧的系统性崩溃之后，经济学家们很快又犯了第二个错误。这一次他们没有预见到因转型而导致的经济下滑的剧烈程度。主要是出于理论上的判断，他们预期经济复苏会来得快一些。就预测东欧转型过程中的政治态势而言，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表现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在东欧突飞猛进的年月里出现的乐观情绪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之后，悲观就变成了主导性情绪：“最有反讽意味的是，最能直接说明东欧局势的可能是美国研究人员以前有关拉丁美洲‘民主体制失败’的研究成果，而不是最近的有关‘民主化转型’的研究文献。”（Jowitt, 1992, 220）肯尼斯·乔伊特（Kenneth Jowitt）只是对东欧民主化进程的可行性表示疑虑的许多理论家中的一位。这一点实际上也特别富有反讽意味：对后共产主义时期不稳定或崩溃前景的描绘比以前对共产主义体制崩溃的描绘更加深入。我们可以发现，至少有三“类”悲观看法。

许多人指出，共产主义体制没能为民主政体奠定基础。因此，民主政体前提条件的缺失（包括没有制度化的政党、缺乏职业政治领袖、不存在负责任的精英群体、没有有效的政府机制、缺乏组织化的民间社

会、没有发达的中产阶级以及历史上不存在企业家精神——这些还只是一长串前提条件中的一部分）被视为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国家民主体制巩固与政治稳定的障碍。

另有其他一些专家不太强调共产主义体制没有创造适当的条件，转而认为共产主义体制所遗留的传统不利于民主体制的稳定。极权体制下的人们有这样一些特点：从众行为、对威权或非法行为冷漠的纵容以及对自由的恐惧，同时还有其他方面的特征，而对平等主义与家长式统治的渴望又迫切要求实行共产主义式的道德经济体制（Jowitt, 1992; Offe, 1993, Grawford and Lijphart, 1995）。

尽管人们很容易就能证明，东欧国家缺乏发育成熟的西方式民主体制所包含的许多要素，而且苏联式共产主义传统不会有正面影响，这本身并不构成足以证明民主体制不能在东欧扎根的充分理由。从方法论上讲，人们应该注意不要重复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曾在不同场合激烈批评过的错误方法。一些人曾以19世纪欧洲大陆的经济体缺乏工业化的前提条件为借口而错误地将它们与英国的经济体作概念性区分。正像他所指出的那样，这些人必然忽略了欧洲大陆产业革命的制度性手段：为长期投资提供资金的银行以及政府（Gerschenkron, 1962）。

在试图理解民主体制的发展状况时，我们也不得不考虑吉耶尔莫·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就下述做法提出的忠告：通过“描述各种政体在政治与经济方面的不幸遭遇”来归纳它们的特征，并说明“那些国家不具备哪些方面的特征——代表性、制度化程度以及诸如此类的特点”，因为“根据新生民主体制不具备某些特征的事实对其作目的论式的定性会妨碍对新生民主体制间的差异作概念性分析”（O’Donnell, 1993, 1356）。

最后，有关民主体制失败的文献中最常用到的一个观点是，据说同时进行的经济与政治转型相互间没有兼容性（Elster, 1993）。我现在要说

的就是这种论点以及对其的评价。²拥护缺乏兼容性说法的人通常要么是指这样的一种洞见：过去的经济危机常常会危及民主体制的稳定；要么是指参与性政治改革与排他性经济改革在逻辑上相互矛盾。

虽然亚当·普热沃斯基（Adam Przeworski）主要担心的是“不可避免的威权体制的诱惑”，“财政上破产的政府”对民主体制的认可度下降，以及有挫败感的改革精英（Przeworski, 1991, 189—190），大卫·奥斯特（David Ost）认为新独裁的危险将来自下层民众——“那因将赌注加于精英头上而被边缘化的亿万民众，而精英也变得愿意接受煽动家的蛊惑”（Ost, 1992, 49）。埃伦·科米索（Ellen Commisso）、史蒂文·杜布（Steven Dubb）和朱迪·麦克蒂格（Judy McTigue）进而总结道，有产阶级的捣乱行为可能是阻碍经济调整与政治稳定化的关键因素（Commisso, Dubb and McTigue, 1992, 27—28）。

至于因此而导致的恐怖后果，观察家们表示担心“群体性抗议的升级与激烈化”（Ekiert, 1993, 31），“不讲规则的运动、罢工以及集体表达方式的泛滥”（这可以吞噬掉整个政治生活）（Ágh, 1991, 119），以及更为渐进但危害度不减的对民主体制支持度的侵蚀（Przeworski, 1991, 190）。其中后者表现在对政党、政府、制度与政体的支持度减弱。而且因经济危机与经济改革而出现的贫困问题也经常被当作“整个中东欧范围内迅猛增加的民族主义与种族暴力、种族主义与憎恶外国人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Walton and Seddon, 1994, 327; Ost, 1995, 178）。出于这样的担心，一群分析家警告，“反动的、民粹主义的、威权主义的以及沙文主义的政治势力”可能会被动员起来（Offe, 1993, 660），同时其他人预测东欧会出现像“佛朗哥（Franco）的西班牙或者上校们的希腊、庇隆（Perón）的阿根廷或者皮诺切特（Pinochet）的智利”那样的政权（Lomax, 1993, 5），“民粹式的发展局面”（Hausner, 1992, 129）、“民粹型威权主义”（Ost, 1995, 50）、“知识分子精英的独裁体制”（Lomax, 1993, 9）或者在“多数人暴政”型的改良独裁体制下的“威权